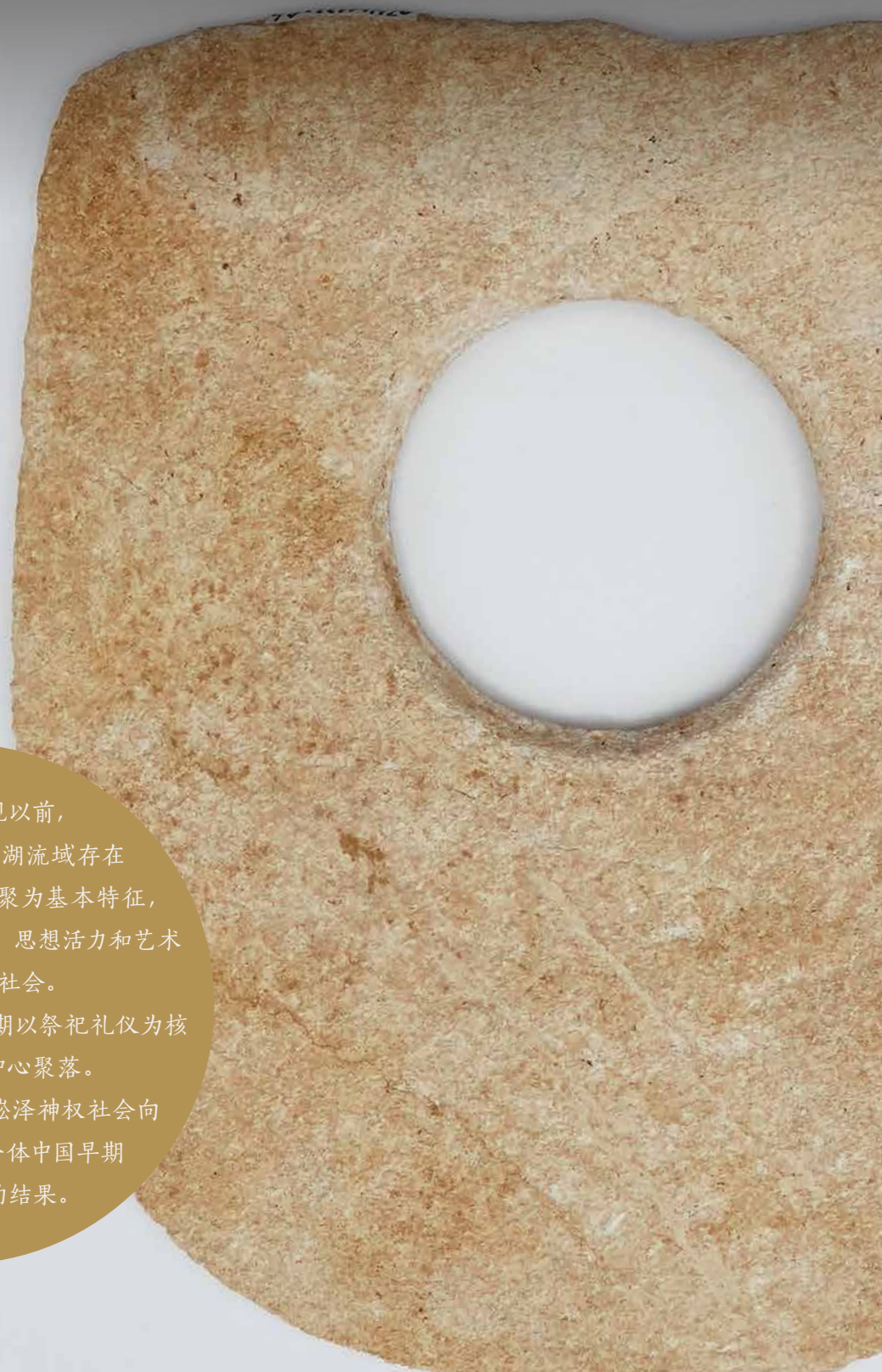
[封面故事]

凌家滩与崧泽社会

兼论考古学文化与区域社会的关系

叶润清 |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



在良渚国家出现以前，
长江下游的太湖和巢湖流域存在
一个金字塔式以神权凝聚为基本特征，
极具经济活力、文化活力、思想活力和艺术
创造力的崧泽社会。
凌家滩，是崧泽社会中晚期以祭祀礼仪为核
心功能的超大型中心聚落。
良渚国家的产生，正是崧泽神权社会向
良渚集王权神权于一体中国早期
文明社会演进的结果。



凌家滩遗址全景
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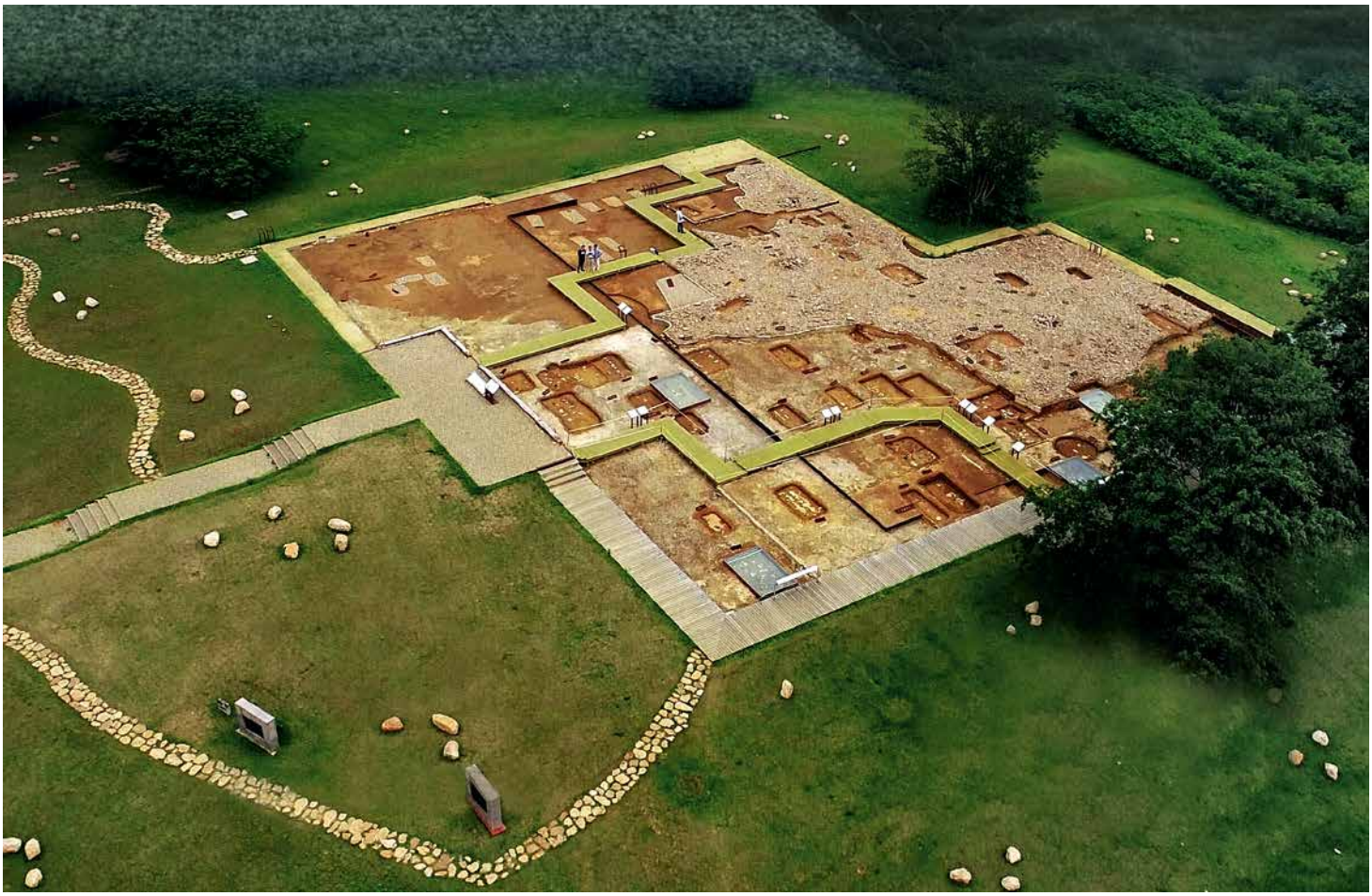
距今约六千至五千三百年，在良渚国家出现以前，长江下游的太湖和巢湖流域存在一个金字塔式以神权凝聚为基本特征，极具经济活力、文化活力、思想活力和艺术创造力的崧泽社会，亦即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崧泽文化。凌家滩是崧泽社会中晚期精心选择区位环境，在巢湖东岸太湖山下营建的以祭祀礼仪为核心功能的超大型中心聚落。良渚国家的产生，正是崧泽神权社会向良渚集王权神权于一体中国早期文明社会演进的结果。

凌家滩遗址的功能性质

凌家滩遗址[1]北靠太湖山，南临裕溪河，区位环境、自然资源条件优越，是崧泽社会中晚期精心营建的一处超大型聚落，面积达160万平方米，以内外两道环壕进行规划布局并构建防御体系。内环壕南侧核心区是一处面积三千多平方米、普遍厚达约一点五米的大型红烧土结构公共建筑基址，基址东北部发现陶缸类祭祀用具；内外环壕之间是超大型祭坛与神巫墓地，并在其西侧发现一处大规模燎祭场所。二者之间有宽约十五米的通道相连。

凌家滩祭坛是祭祀天地万物自然神和神巫通天的神圣场所；大型红烧土结构基址上是祖神庙兼具宫殿类功能的公共建筑，是祭祀祖先神和神巫开展社会公务活动的地方。

超大规模祭坛及燎祭遗存，祖神庙与神巫墓地，钺、璜、镯、璧和玉人、玉龙、玉鹰等共同构成的祭祀礼仪性玉器体系及陶缸类祭祀用具，充分揭示了凌家滩遗址较为纯粹的祭祀礼仪性功能，同时也直观反映了凌家滩祭祀类型的多样性、祭祀程序的复杂性和祭祀仪式的神圣性。



凌家滩遗址祭祀、墓葬区 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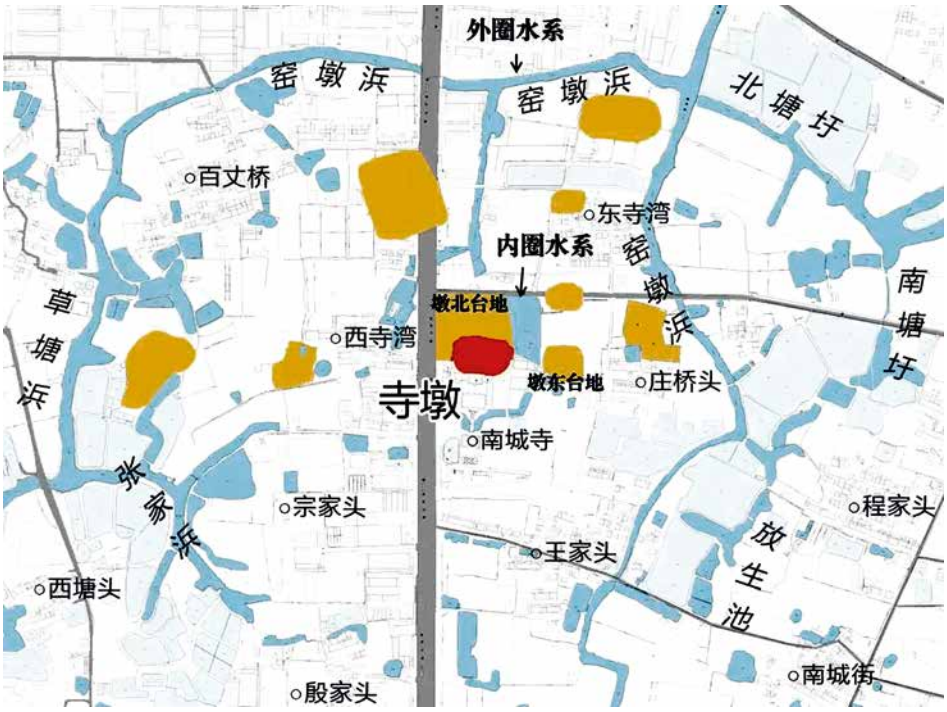
崧泽社会的结构特征与管理模式

金字塔式以神权凝聚，复杂化、层级化，是崧泽社会的基本结构特征，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理解：

一是聚落规模层级化。在长江下游太湖到巢湖流域的广袤空间范围内，迄今已发现崧泽文化遗址数百处。处于金字塔式崧泽社会塔尖上的，目前只有凌家滩一处，为超过 100 万平方米的特大型中心聚落；处于第二层级的有金坛三星村[2]、常州寺墩[3]、张家港东山村[4]等遗址，为面积 10 万到 100 万平方米之间的大型次中心聚落；处于第三层级的有南京薛城[5]、北阴阳营[6]、郎溪磨盘山[7]、嘉兴南河浜[8]、上海青浦崧泽[9]等遗址，为面积 1 到 10 万平方米之间的中型聚落；处于第四和更低层级为面积不到一万平方米的小型聚落。

二是聚落功能层级化。上述第一、二规模层级的遗址，均发现祭祀礼仪性遗存和神巫墓葬，出土玉质、象牙质等祭祀礼仪用品，及由此衍生的与早期天文历法、几何数学知识、陶塑艺术等相关的器物类型，其中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八角星纹图案玉版和玉龟组合被有关研究者认为是我国迄今所见最古老的太阳历和实物宇宙模型[10]；第三层级以下规模的遗址则不见或罕见祭祀礼仪性遗存和神巫墓葬，陶塑艺术品则在不同规模层级的遗址中均有发现。

三是社会分工层级化。处于金字塔式崧泽社会塔尖上的，是掌管至高无上祭祀礼仪权并拥有公共资源调配和社会业态与技术管理权的



寺墩遗址及其外围水系　作者提供



薛城遗址及周边环境　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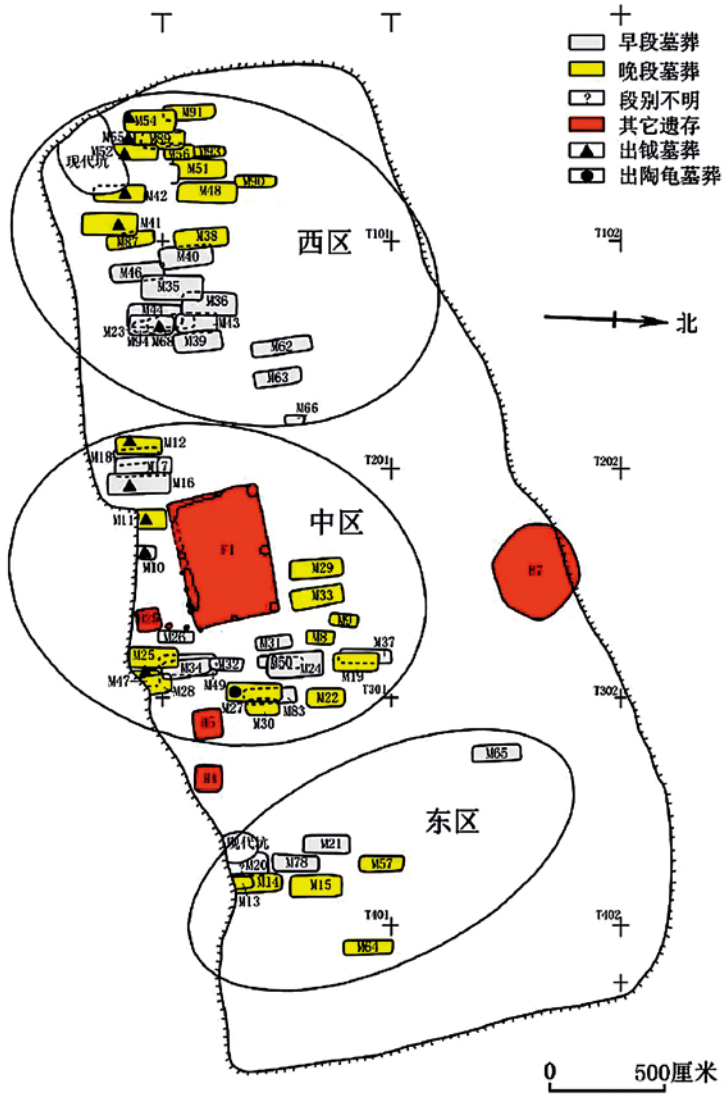
神巫阶层；处于社会中层的，是从事玉石器、象牙器等祭祀礼仪用品加工制作的高级手工业技能人员；处于社会下层的，是稻作农业、植物采集、渔业及动物捕猎、禽畜饲养业、纺织业、制陶业等从业者，也是社会经济基础的维系和支撑阶层。

除了结构层级化，崧泽社会也是我们迄今所见文化因素最为复杂、文化融合发展最为成功的史前区域社会之一，无论是皖西南地区的黄鳝嘴文化、薛家岗文化，还是淮河中下游地区的双墩文化、侯家寨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甚至中原地区

的庙底沟文化等诸多文化因素，我们都能在崧泽社会找到，集众家之所长且不失自身特色，而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和渔牧业生产，工艺精湛的玉器、石器、象牙器制作，琳琅满目、极具艺术创造力的各类陶塑动物造型，更是充分彰显了崧泽社会的经济活力、文化活力、思想活力、艺术创造力以及兼容并包的社会特点。这可能也正是学界在提出崧泽文化之后，又相继提出北阴阳营、凌家滩等考古学文化或文化类型并进而提出崧泽文化圈的原因所在。

考古学文化是对存在于一定的时间段、分布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具有共同内涵特征的文化遗存综合体的统称，一般由数量不等的聚落遗址群构成。考古学文化可能是古代一个或几个关系密切的族群创造并受到其他文化影响的地域土著性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共同体，但又并非完全一一对应关系。

考古学文化概念在我国多适用于命名新石器时代以及夏商周王朝直属文化区以外的地域文化，就其本质而言，同时也是一个区域社会的概念，无论这个考古学文化或区域社会是大是小。基于社会发展进步和文化间相互影响、交流互鉴、融合发展和源流传承等特点，考古学文化或区域社会总体而言有分布范围从小到大、聚落群体数量从少到多、聚落规模从大致相当到出现大小分化、文化内涵从简单到复杂等的演化趋势，具体表现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多为生产力相对落后、物资相对匮乏、结构相对松散的平等社会，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如崧泽文化时期，多出现聚落数量大增，聚落规模、聚落功能层级化等特点，金字塔式区域社会的特征也更加明显，神权阶层的上层建筑与农业、手工业阶层的经济基础缺一不可，共同构建和维系支撑一个完整的区域社会。



南河浜遗址崧泽文化晚期墓地布局　作者提供

从崧泽社会到良渚古国

在长江下游地区的早期祭祀礼仪性玉器体系中，除玉琮为良渚文化所特有外，其他主要玉礼器在崧泽社会均已出现，崧泽社会是中国史前极少数从“以玉为美”到“以玉为礼”的时代变革者和开创者之一。

无论是主要依赖神权凝聚的崧泽社会，还



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大墓 作者提供

是集王权神权于一体、王权占主导地位的良渚早期国家[11]，祭祀礼仪活动都是其社会政治生活最重要的内容。玉器被视为权力与地位的象征，为满足祭祀礼仪活动需要，玉器制造业成为崧泽和良渚社会业态与生产链技术链的最高端，稻作农业、畜牧业、渔业，陶器、漆木器、丝织品加工业，建筑业，水利及交通运输业等其他行业虽然高度发达，但均处于基础支撑和服务保障地位，导致了崧泽和良渚社会分工的层级化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高度复杂化。

2007 年发掘的凌家滩遗址 23 号墓（07M23），揭示了一座上下 2 至 6 层，由钺、璜、玦、璧、锛、龟等三百多件玉石器构建的崧泽文化晚期“玉敛葬”[12]，神权祭祀阶层在崧泽社会的地位之高由此可见一斑；高等级祭祀礼仪功能区在凌家滩的出现，则体现了崧泽社会强大的统一规划布局和组织管理能力。结合其他崧泽文化遗存的大量发现，足以说明崧泽社会内部分化明显，已处于早期文明起步和国家萌芽状态。但具有区域性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性质的都邑性城市尚未出现，崧泽社会不同区域传统土著特征仍然存在甚至比较明显，极具文化活力、思想活力和艺术创造力的社会特点尚未因国家性质的王权制约而受到影响。

良渚文化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发展、人口增加、社会分工和社会复杂化程度不断加剧，出现阶级，王权统治不断强化并超越神权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凝聚力控制力空前加强，最终导致了中华早期区域性文明良渚国家的诞生。

王权国家、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和组织力，区域政治中心伴随统治者意志而转移，都邑性城市及规模宏大的防洪水利系统出现，玉礼器体系进一步完善、规制及工艺要求趋于一致，核心区文化面貌相对统一，在长江下游和新安江–钱塘江流域实际控制和影响范围超过 10 万平方公里等，是良渚迈入文明社会门槛的具体表现和



崧泽文化　石钺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编号 07M23:86



三星村遗址出土的大穿孔石钺



崧泽文化　玉璜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编号 07M23:62



崧泽文化　玉玦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编号 07M23:62



东山村遗址红烧土祭祀场所出土的玉璜



崧泽文化　玉镯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编号 07M23:137



崧泽文化　玉斧
长 23.8 厘米
刃宽 6.4 厘米
最厚 1 厘米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
编号 07M23:122

主要标志，王权国家的诞生则是首要标志。

从崧泽社会到良渚古国，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中国早期社会复杂化、文明化演进路径与模式最清晰最成功的案例。无论是背山面水的区位环境，还是“以玉为礼”观念与祭祀礼仪性玉器体系，良渚都继承了凌家滩，并在此基础上创新了玉琮和形象高度统一的神人兽面徽标，正是在继承、发展、创新凌家滩的基础上，才有了良渚文明的诞生，由此奠定了长江下游中国早期的政治中心地位，并进而延续了该地区上千年的经济与文化繁荣。

与崧泽社会基本同时甚至起步更早，且同样出现类似凌家滩遗址的祭祀礼仪中心的牛河梁的红山文化[13]，其后续并没有出现一个类似于良渚的强大国家。而无论是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距今五千年前后虽然出现了诸如河洛古国[14]、大汶口古国[15]、屈家岭古国[16]等早期国家的萌芽或雏形，但都没有发现类似于凌家滩的浓郁神权社会特征、奢侈随葬品大墓和类似于良渚的都邑性城市及高度统一的神人兽面王权标识。中原地区直到陶寺[17]、石峁[18]带有明确王权国家特征的都邑性城市和王级大墓的出现，才正式宣告其中国早期文明中心地位的确立。其中原因，除了不同文化区选择表达史前社会复杂化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19]外，是否与中华早期的玉器文明特质[20]以及玉料资源、工艺、人才的地区差异存在关联，同样值得深入研究。



良渚文化　五节人面纹玉琮式管
高 7.3 厘米　宽 1.5 厘米　厚 1.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良渚文化　玉璧
外径 19.3 厘米　内径 4.4 厘米　厚 2.1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良渚文化
十五节神人纹玉琮
高 40 厘米
上边长 7.8 厘米
下边长 6.8 厘米
安徽博物院藏

注释

〔1〕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玉器》，文物出版社，2000 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 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 年；吴卫红《朔知东南风：从凌家滩到长三角的区域文明探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年。

〔2〕 王根富、张君《江苏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2004 年第 2 期。

〔3〕 南京博物院《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 年第 3 期；《1982 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 年第 2 期；余官玥、于成龙、陈钰《江苏常州寺墩遗址》，《大众考古》2024 年第 7 期。

〔4〕 胡颖芳、周润垦、钱春峰等《张家港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5 年第 1 期。

〔5〕 薛城考古队《南京史前考古的重大收获——高淳薛城遗址的发现及初步认识》，《南京史志》1998 年第 2 期。

〔6〕 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 年；仲召兵《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墓地分析与探讨》，《东南文化》2007 年第 2 期。

〔7〕 赵东升《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大众考古》2024 年第 2 期。

〔8〕 刘斌、蒋卫东《浙江嘉兴南河浜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5 年第 6 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 年。

〔9〕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 年；张明华《青浦福泉山遗址崧泽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 年第 3 期。

〔10〕 石云里《正在故宫展出的凌家滩玉版是目前所见最古老的太阳历》，《天文志》微信公众号，2024 年 12 月 27 日；石云里《正在故宫展览的凌家滩太阳历玉版和玉龟组合是目前所见最古老的实物宇宙模型》，《天文志》微信公众号，2024 年 12 月 29 日。

〔11〕 李新伟《良渚——撞击与熔合的文明结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 年。

〔1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 年第 3 期。

〔13〕 郭明《红山——中国文化的直根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年。

〔14〕 胡洪江、蒋川《河南巩义发现 5000 多年前“河洛古国”，不排除是黄帝时代都邑所在》，《人民日报》2020 年 5 月 8 日；杨文佳《五千多年前“河洛古国”的不平凡在哪？》，新华社客户端 2020 年 5 月 17 日；范毓周《河南巩义双槐树“河洛古国”遗址浅论》，《中原文化研究》2020 年 8 月第 4 期。

〔15〕 白鹏《永城王庄遗址发现 5000 年前古国君主墓葬》，《商丘日报》2024 年 10 月 18 日。

〔16〕 彭小军《屈家岭——五千年前的众城之邦》，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 年。

〔17〕 何努《陶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观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年。

〔18〕 孙周勇、邵晶、邸楠《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中原文物》2020 年第 1 期。

〔19〕 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 年第 3 期。

〔20〕 叶润清《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揭示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内在机制和演进路径的重要切口》，《中国文物报》2022 年 6 月 24 日；“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 2022 年 6 月 8 日。